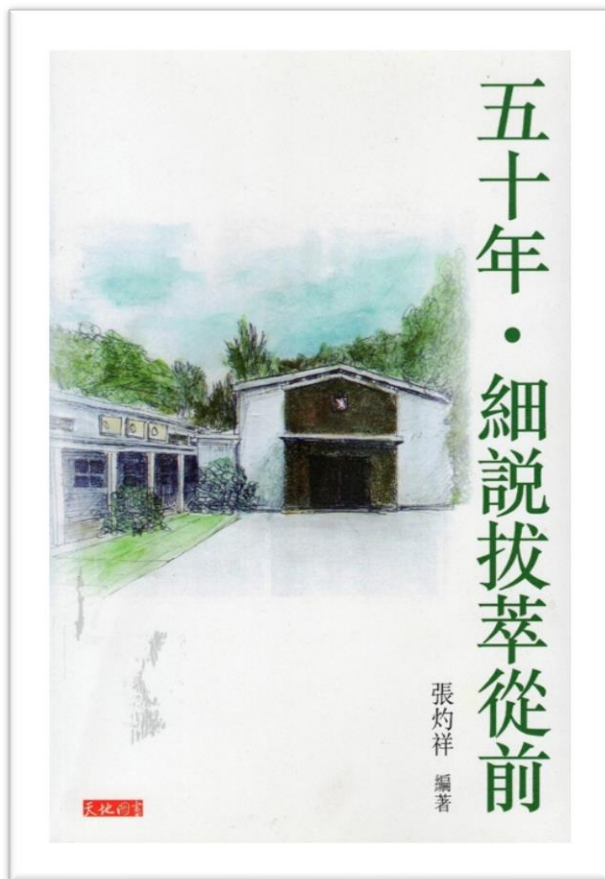


潤物細無聲 ---- 黃賢專訪

-- 摘自張灼祥《五十年·細說拔萃從前》



第二章 請他們來說

似水流年——馮以滋專訪 / 42

回首念恩情——湯顯森專訪 / 54

潤物細無聲——黃賢專訪 / 68

慶幸能作拔萃人——方游專訪 / 83

慎言敏事為君子——葉漢強專訪 / 92

五個訪問後記——鄭潔明 / 103

中國紳士的搖籃者——郭慎塚校長 S. J. Lowcock / 105

霄雲哥在男拔萃的日子 / 116

緣——Mr Lowcock 與我 / 120

學校小食部的老柴 / 126

第四章

打籐 / 130

DBS Cricket Team / 132

DBSAC: The Chairman's Message / 133

S. J. Lowcock the Headmaster we knew / 137

Lowcock's belief in Sin, Atonement and the Cane / 150

Jimmy Lowcock—the teacher who affected me most at DBS / 153

The Chicken Hawk / 1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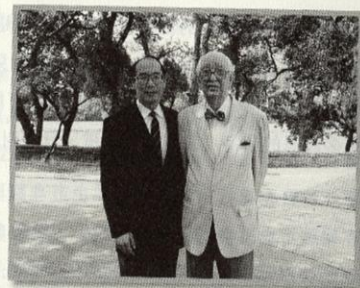
潤物細無聲——黃賢專訪

11月初，約黃賢訪談，他爽快答應。但是因為社會運動，交通不便，訪談一再延期，直至11月尾才有機會見面。黃賢約我到灣仔一間會所餐廳，那裏環境寧靜，可眺望維多利亞港和香港摩天輪。訪談前，我先為會面延期致歉，穿着恤衫西褲的黃賢從容地說：「不要緊！」侍應端來一壺濃普洱，正要為黃賢斟茶，他說：「先放着。」聽黃賢細說經歷後，我更加明白茶葉和人生，也是要慢慢浸泡，才會飄香。

歷史的偶然

黃賢在1956年入讀拔萃小學，他形容報讀小拔，是「歷史的神奇故事」。「家人的朋友和我的契爺全都是讀喇沙的。小時候，媽媽帶我和哥哥到九龍塘的公園玩，有個外國女人在吃三文治，她跟媽媽說你的小孩要讀書了，並叫我們試試報讀小拔萃，我和哥哥就去考小拔。」而拔萃舊生的身份曾經引來笑話，「契爺生前是喇沙最早期的校友

之一，他的追悼會要籌款給喇沙基金會，我就捐不出手了，大家都笑我。」黃賢哈哈地笑，說：「歷史有很多偶然」。



黃賢與校長 Mr Lowcock

而黃賢與校長 Mr Lowcock 的相遇，也是特別的偶然。黃賢小四時，爸爸逝世，媽媽做記者，工作很忙，經常不在家。1961年，他到男拔升讀五年級，就和哥哥在男拔寄宿。在開學前的星期六早上，喜歡跑步的黃賢，第一次來到男拔的校園，看到偌大的操場，就在那裏跑步，然後在榕樹下休息。那時，Mr Lowcock 走來，為他把脈，叫他繼續跑。「當時我覺得很奇怪，他把脈後就走了。那時自己很矮，覺得他很高。」兩天後開學，黃賢才知道原來這名奇怪的男士，正是新上任的校長。

Mr Lowcock 的標記，是唇上的鬚鬚和飽滿的下巴，他

潤物細無聲：黃賢專訪

十一月初，約黃賢訪談，他爽快答應。但是因為社會運動，交通不便，訪談一再延期，直至十一月尾才有機會見面。黃賢約我到灣仔一間會所餐廳，那裏環境寧靜，可眺望維多利亞港和香港摩天

輪。訪談前，我先為會面延期致歉，穿著恤衫西褲的黃賢從容地說：「不要緊！」侍應端來一壺濃普洱，正要為黃賢斟茶，他說：「先放著。」聽黃賢細說經歷後，我更加明白茶葉和人生，也是要慢慢浸泡，才會飄香。

歷史的偶然

黃賢在 1956 年入讀拔萃小學，他形容報讀小拔，是「歷史的神奇故事」。「家人的朋友和我的契爺全都是讀喇沙的。小時候，媽媽帶我和哥哥到九龍塘的公園玩，有個外國女人在吃三文治，她跟媽媽說你的小孩要讀書了，並叫我們試試報讀小拔萃，我和哥哥就去考小拔。」而拔萃舊生的身分曾經引來笑話，「契爺生前是喇沙最早期的校友之一，他的追悼會要籌款



黃賢與 Mr Lowcock：慶祝成立 Lowcock House

給喇沙基金會，我就捐不出手了，大家都笑我。」黃賢哈哈地笑，說「歷史有很多偶然」。

而黃賢與校長 Mr Lowcock 的相遇，也是特別的偶然。黃賢小四時，爸爸逝世，媽媽做記者，工作很忙，經常不在家。1961 年，他到男拔升讀五年級，就和哥哥在男拔寄宿。在開學前的星期六早上，喜歡跑步的黃賢，第一次來到男拔的校園，看到偌大的操場，就在那裏跑步，然後在榕樹下休息。那時，Mr Lowcock 走來，為他把脈，叫他繼續跑。「當時我覺得很奇怪，他把脈後就走了。那時自己很矮，覺得他很高。」兩天後開學，黃賢才知道原來這名奇怪的男士，正是新上任的校長。

Mr Lowcock 的標記，是唇上的胡鬚和飽滿的下巴，他因而有「蝦餃佬」的花名。「他也知道這花名，當然我們不會在他面前叫，只是閒談時，被他聽見了。」而同學之間，也是以花名相稱。「在拔萃，花名可能比名字還重要。很多同學的名字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只是叫花名。」

黃賢在男拔寄宿九年，「由五年級至 Upper Six 都住在學校，幾乎沒有人打破這紀錄」。他參加跑步、唱歌、話劇等多項課外活動，漸漸跟 Mr Lowcock 相熟，後來更有機會到訪 Mr Lowcock 的家。「我班放學後舉辦讀書會，但沒有地方，就到 Lowcock 家。他的家是開放的，可以隨時出入，看書，聽唱片。」不過，Mr Lowcock 不會參與讀書會，「他的特色是無必要時，不會參與，讓我們自己發揮，我們做不來，有時他會來執手尾，自主是他的管治方式。」

學生以外的職份

黃賢最欣賞 Mr Lowcock 信任學生。他讀 Upper Six 時，一位老師未能到校任教，Mr Lowcock 邀請修讀理科的他，教中四的歷史和 Lower Six 的經濟，他教了一個學期，才找到老師。他呷一口茶，謙稱成績不算很優異：「我未考過第一，但歷史科成績挺好，教經濟是因為中四做過生意。」

黃賢曾與同學營運學校餐廳，「1967年，承包學校餐廳的伙頭『打斧頭』，食物越來越差，寄宿生罷食一星期，校長查清楚後，立即解僱他。Lowcock 決定由罷食學生營運廚房，照顧近百名寄宿生的一日四餐，以及幾百名走讀生的午飯。我們由入貨、煮飯，訂菜



黃賢和 Mr Lowcock：擔任計時員

單，全都一手包辦。起初覺得很有趣，還請法國老師做顧問，捱了兩個月，大家都累得不得了！」Mr Lowcock 肯定學生的努力，在交給校董的報告，也提到學生營運餐廳的來龍去脈。

作為 Boarders' Prefect，黃賢還有特別的任務。「67 年左派暴動，有人四處放炸彈，我們 Boarders' Prefect 要半夜起床，巡視學校每一個角落，看看有沒有炸彈。」男拔的操場底下以前是日軍的軍火庫，曾經發生炸彈爆炸，一座山崩了一角，還導致傷亡，所以 Boarders' Prefect 檢查時格外認真。

Mr Lowcock 擔心暑假時學生在街上流連，會被炸彈所傷，決定開放校園，讓全校學生回校玩樂。黃賢擔心小食部未能應付需求，由於他有營運餐廳的經驗，Mr Lowcock 容讓他與十幾個寄宿生經營小食部。剛巧學校免費借場地給邵氏拍青春片，電視台也按照黃賢畫的設計圖，幫學校訂做吧枱。

在膳食方面，黃賢和同學新增熱狗等菜式，「我們靠自己買材料，訂貨取折扣。Lowcock 叫我穿校服，打領呔，去嘉頓（食品公司）見總經理，他很認真地問我要訂多少麵包，我說一星期大概兩包（一包六個）。」黃賢舉起兩隻手指，笑彎了腰。「當時沒有經驗，不知市場反應如何，擔心賣不完。但總經理請公司的律師為兩包麵包制訂合同，雙方都要簽名，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！」黃賢和我都忍不住笑。「當然那份合同是沒有法律效力的，因為我未成年。但我了解到法律程序，知道整個流程是這樣的。」原來這位總經理是男拔的校友，特意花時間讓師弟見識大場面。

不過，後來黃賢卻被送麵包的小子責罵了一頓，「他罵我向總經理訂貨，令他沒有佣金，他說平時即使訂幾千打，也不能見上層的總經理。我了解到社會是層層都要照顧到的。」後來，黃賢直接向送麵包的小子訂貨。「小食部營運了兩個月，賺了二十多元，我們把錢送給打雜的職工。沒有人能賺錢，學校還蝕了燈油火蠟。但社會作用很大，很多人回校，生意很好，很開心！後來68年的暑假，我們再做一次。」營運學校餐廳和小食部的經驗，有助黃賢在1975年於 Baker & McKenzie 當實習律師時，處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宗的破產案（和記破產案），「因為同樣要處理 cash flow，做 stock take 和計數。」黃賢笑言經營小食部和餐廳要計算同學偷吃了多少食物，但是他沒有追究，他強調「又要認真，又要講人情」。

敢於求變

黃賢說：「拔萃的成功是多元化，校長在一定的空間內，會任由學生發揮。」

校徽的改變是一大變革，「1969年，我讀 Lower Six，學校慶祝一百周年，Upper Six 那班決定改變校徽。以前的校徽是刺繡的，很貴，差不多等於一個月的學費。男仔一打架，撞一撞，鐵絲就突出來，珠又掉下來。我哥哥是 Senior Prefect，他和 Second Prefect 將繁複的設計變得簡單，用化纖織校徽，價錢大約便宜八成。」他們做了三個大小和顏色深淺不同的校徽，黃賢建議由全校的老師、學生和職工投票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他笑言這是「香港第一次普選」。

黃賢積極組織各項活動，獲 Mr Lowcock 選為 Boarders' Senior Prefect，他隨即向校長提倡改革，例如縮短午膳時間，讓學生提早放學。他強調：「關鍵是要給學生決定，而全校職工都可以投票。」另外，校方一向禁止學生攜帶象徵身份階級的物品，例如手錶、戒指和收音機等，亦禁止看漫畫和武俠小說，黃賢提議要因時制宜，作出解禁，「到 1969，收音機已經不是階級的象徵，要解禁。武俠小說如金庸的《仙鶴神針》、*Peanuts* 漫畫，都要解禁。」他認為最大的變革，是在洗手間增設廁紙，因為「這不單是解禁，而是校方須要付錢」，雖然學校當時經濟不太好，但 Mr Lowcock 知道學生的需求很大，先後在宿舍和學校的洗手間增設廁紙。

黃賢在爭取訴求的過程中，也曾觸怒 Mr Lowcock，但他強調「最重要是敢說應說的話」，「只要有道理，校長都會接受」。若然學生犯錯，也要接受懲罰。「學校最高的懲罰是打藤（caning），體罰在拔萃是身份象徵，你未被體罰過，代表你未挑戰過規定，或者未冒過險，我們以打藤為榮！」黃賢坦言也曾被校長打藤，「但已忘了因為甚麼事，反正只是身份象徵。」他認為體罰也有「洗底」的意義，「即使你犯了最大的錯，打藤後，學校就不會有紀錄。學校不想同學怕檔案被『畫花』，就太過謹小慎微，甚麼都不敢做。」

拔萃的教育，擴闊了黃賢的眼界，亦培養了他敢作敢為的作風，令他在哈佛大學的面試中，脫穎而出。「當年美國有名的教授來香港面試，美國官方支持的教育機構、官員和教授一排人坐著面試，與見嘉頓的總經理差不多。」以往的經驗，令黃賢面對大場面也毫不怯場。他在面試時，敢於指正教授的話，令他成為當年唯一一位獲哈佛大學取錄的香港學生，並獲得全額獎學金。

黃賢在哈佛大學修讀生物工程，研究分子遺傳，也修讀歷史。「我每天要花二十小時在實驗室，當時保釣運動開始，我面對人生的抉擇：我應該留在實驗室，還是街頭？最後我放棄生物，選擇街頭，主修歷史。」

1970年，他參與保衛釣魚臺運動，1972年以保釣第一團的成員身份，回國參觀。畢業後，他修讀法律，成為博士（Juris Doctor）。1978年，黃賢應邀到北京外貿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，並兼任多個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。

「拔萃有個特色，就是要幫助弱者。當時北京處於文革後期，開明了一點，不過是弱者。

1978年，北京準備開放，我就去幫助它。」黃賢一心幫助中國，卻在1982年，被控間諜罪，囚禁在秦城監獄。問他有沒有感到被背叛，他說：

「如果單獨看這件事，就會



黃賢、Mr Lowcock 與 Rahman：在拔萃的訓練，讓同學無懼人生挑戰

這樣想。但如果你看整段歷史，就明白不是這樣發生才奇怪。知道歷史是怎樣發展，加上拔萃的訓練，就要想想如何打這場仗，運籌囹圄。」

獄中的生存之道

拔萃的教育，培養了黃賢抗逆的能力，他說：「拔萃是天掉下來都當沒事的」。他知道與獄吏對抗，只會有反效果，想起為嘉頓送麵包的小子，記起要與每一層的人混熟，於是坐牢後第一件事，就是與看守的士兵聊天。「他們只是十幾歲的小朋友，兩個小時輪一班，悶極了。我就與他們聊天，問他們住在哪裏，家鄉在哪。他們上班前，路過果園會偷水果給我，吃飯時又多拿些餸菜給我，他們說：『寧願扣江青的餸，都要多拿一些給你。』傳聞江青的胸部和臀部是假的，我就問男兵，男兵就哄女兵說出真相，然後有一天，一群男兵走過來說：『真的！真的！』」黃賢就這樣建立了獄中友誼。

黃賢提到《魯賓遜漂流記》，說落難首先要做盤點，「盤點自己的優勢：誰會幫我？誰會害我？誰會怎樣幫我？誰會怎樣害我？分析過後，我得出的結論是：我應該會贏的。」黃賢雖然被困，但仍然樂觀，還笑說：「在中國單獨被困，是身份的象徵。」

黃賢被困在四百呎的牢房，無法接觸外界的訊息，只能看人民日報，監獄圖書館的科學書和幾本古代小說。但是他仍有方法分析形勢，「我會觀察審問我的人的反應和語氣，知道他在想甚麼，再

調整方案。」他仍本著拔萃精神，據理力爭，「我發現隔壁的張春橋有書枱，我就投訴，過兩天就有書枱給我了。」

從前在拔萃談判的經歷，有助黃賢與中國政府談判。「拔萃一百周年，要請港督來參觀，我堅持拔萃的傳統，見先生後，就見學生，而不是只見先生就離開。我與港督府的副官談判，討論港督來時的儀式，堅持他要見學生。最後港督先在學校正門，與 Lowcock 和先生談十分鐘，然後走到新翼，我向他介紹 prefects。」

即使面對強權，黃賢仍無畏無懼。基於國際的壓力，1985 年，鄧小平宣佈黃賢假釋，但他不接受。「我說：『我不要，我要你認錯。』，令鄧小平很愕然。假釋是要開庭的，他們突然把我由監獄綁架出來，叫我簽紙，我就寫『文責不負』。我反對，我要上訴。」他深知這樣假釋是非法的，「假釋有兩個條件，第一是認罪，第二是要服刑滿一半。但我未夠一半，更加不會認罪。」他托一托眼鏡，說：「我是教法律的，這些不合法的事，我不會做。如果我接受假釋，即是間接認罪，那麼我的學生、曾經與我一起辦事的官員都會受影響。」

黃賢為免連累他人，不願接受假釋，而在 1989 年，幫他翻案的人，正是他曾經幫過的人。「江澤民年青起家時，我曾經受汪道涵所托，幫他處理一些很複雜而又很政治化的投資項目（第一個工業合資項目，外資是香港怡和牽頭的迅達電梯）。後來他做了總書記，很多領導都認為是時候解決這件事。」雖然黃賢的冤案獲平反，但他等到 1992 年，才決定回港。

薪火相傳

黃賢回港後，就去 Mr Lowcock 的家，他們天南地北，甚麼都談，但沒有提到這次冤獄，Mr Lowcock 也沒有提到他在黃賢被囚時，給鄧小平寫過一封求情信。「很多同學追問 Lowcock 如何營救我，他說會寫信給鄧小平。」在 Mr Lowcock 回覆同學的傳真，還寫了”I am doing all I can.”他在信中讚揚黃賢的才幹，情詞懇切地肯定他對中國的忠心，希望鄧小平會重審他的案件。後來，黃賢才從張灼祥校長口中得知 Mr Lowcock 寫過這封信。「Lowcock 就是這樣，幫助人不會講，沒有人知道他幫過多少人。曾經有同學買不起棺材，他就叫 senior 的同學籌款。」難怪黃賢形容 Mr Lowcock 「潤物細無聲」。

Mr Lowcock 從他的導師 (Mentor) Bishop Hall 身上，學會包容和幫助別人，黃賢又受到 Mr Lowcock 影響。「香港社會變革時，要成立很多學校給難民的子女，Bishop Hall 籌辦，請 Lowcock 幫忙，他成為很多學校的校監。聖公會取得土地建學校，很多拔萃的老師都幫忙教學和設計課程。幫助弱者是拔萃的傳統，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。」後來拔萃轉直資，為免拔萃變成貴族學校，黃賢向 Mr Lowcock 提議成立 S J Lowcock Foundation，資助家庭背景欠佳的學生。後來他發現學生不須要資助，就用來資助到海外升學的尖子。近年，黃賢亦組織拔萃的師弟，為新移民學童補習英文。

對黃賢來說，Mr Lowcock 的死，是很大的遺憾。「2011 年 Lowcock 生日，我約他過年後帶一本書給他，以及打算告訴他 Foundation 的籌款結果：一個很喜歡 Lowcock 的校友用一百萬，投

標了他的酒。誰知，過年時他已經昏迷送院。」餘暉的金光斜照在黃賢身上。他形容失去 Lowcock 是很大的損失：「他永遠是很穩定的力量，佔中時，我也要翻出他當年六七暴動寫的觀點。他看事情的眼光，至今仍然適用，就是不分你我，不要推卸責任，當權者要承認暴動是制度製造出來的。」¹



Patrick、Bo Yee、Mr Lowcock、黃賢、Stephen、Desmond

黃賢曾撰寫文章 *Thank you Jimmy*²，提到從 Mr Lowcock 身上，學習了積極的人生觀，發展了內在的力量，去打漂亮的仗。即使談到被囚的生活，黃賢依然在笑。在這次訪談中，他只皺過一次眉，就是在苦思與 Mr Lowcock 有多少張合照的時候。「我不喜歡拍照，

¹ “DBS at 145” (2014.11), <http://wp.me/p28B6z-dv>

² “Obituary: Jimmy Lowcock” (2012.02), <http://wp.me/p28B6z-6q>

他也不喜歡拍照，讀拔萃時拍的照片很少，只有一張，不過只拍到我的背影。」黃賢笑說。

夕陽西下，維多利亞港的船隻慢慢靠岸，岸上的摩天輪開始緩緩轉動。Mr Lowcock 的教導，指引黃賢度過人生的高低起跌。Mr Lowcock 雖然別去，但黃賢說：「我們拔萃人不須要時常見面。」

一切長存心中。



Mr Lowcock 與拔萃仔